

文 史 资 料 选 韶

合 订 本

〔第三十册〕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22.16
2L
=30

合订本

第三十册

(总八十七八十九)

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 王昆仑 王炳南 屈武 (1)
- 附件一 周恩来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同人的谈话 (12)
- 附件二 周恩来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北平诸同志的
谈话 (18)
- 附件三 周恩来同志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
的解释报告摘录 (22)
- 附件四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 (24)
- 附件五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盟员名单 (26)
- 日记片断(1948年12月29日至1949年6月28日) 包尔汉 (28)
- 英伦杂感 费孝通 (48)
- 回忆旅居日本三十二年 吴伯康 (56)
- 回忆越南华侨的爱国救亡运动 徐安如 (72)
- 南非华侨情况忆述 叶 迅 (81)
- 严修与学制改革 王芸生 (96)
- 关于王芸生先生所撰《严修与学制改革》一文写给
吴觉农先生的一封信(节录) 严仁赓 (121)
- 老教育家李湘宸先生事略 杨毓节 (126)
- 国民党政府统治教育事业概述 高思庭 (135)
- 上海泰东图书局与新文学运动 谷馨山 赵树芬 (156)

- “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 陈铭枢 (163)
回忆孙寒冰教授 冯和法 (189)
陈宝箴之死的真象 宗九奇(222)

目 录

邵力子先生致力于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	程思远 张丰胄 (1)
回忆邵力子先生和我的关系	孙越崎 (8)
忆邵力子先生二三事	凌其翰 (16)
怀念新闻师尊邵力子	万枚子 (20)
附录：中国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	邵力子 (27)
我所知道的龚饮冰与建业银行	黄肇兴 (32)
陈光甫的一生与上海银行	袁熙鉴 (64)
我所知道的金城银行	许家骏 (79)
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银行	韩宏泰 (90)
上海商品检验局的筹设经过与初期工作概述	邹秉文 (111)
解放前的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概略	蔡无忌 (121)
我在上海商检局搞茶叶工作的回忆	吴觉农 (148)
漫忆上海商品检验局	冯和法 (162)
农学家邹秉文	恽宝润 (173)
我国动植物检疫工作的今昔	张若蓍 (220)
洗冠生与冠生园	程道生 俞少庵 (224)

目 录

回忆救国会的七人案件.....	沙千里 (1)
回忆冯玉祥将军对救国会的支持.....	孙晓村 (47)
救国会七君子被捕案轶闻.....	谢居三 (51)
陶行知在国外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片断回忆	陆 瑤 (63)
回忆救国会的活动.....	秦柳方 (67)
争民主、反独裁、救中国 ——救国会后期斗争札记.....	张启宗 (86)
星一聚餐会和胡愈之先生	卢广绵 (111)
张澜先生生平事略	吕光光 (115)
回忆香港《光明报》	陆 治 (140)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	鹿钟麟 (150)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组建期中的几件事	高兴亚 (179)

我对爱国将军冯玉祥的了解 王俾如 (188)

张树声是青洪帮头子 孙玉田 (213)

记张树声二三事 王治秋 (216)

质疑·补充·订正

第二次东征中第二师第四团是主攻部队 苏文钦 (220)

刘湛恩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志士 施沐长 (221)

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十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

王昆仑 王炳南 屈 武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秘密组成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它于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夏在重庆成立，积极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南京、北平、西安、重庆和东北等地继续开展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在北平宣告结束，历时八年有余，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起了相当重要的配合作用。

(一)

抗日战争中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于一九四一年一月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共产党展开了进攻，企图以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投降活动，成为当时时局的主要危险。

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其反共投降阴谋，对国民党反动派进

行坚决斗争。同时，鉴于在第一次大革命与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中共党员加以凶暴摧残的惨重教训，为了尽量减少党和进步力量的损失，避免牺牲，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对白区党的工作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方面，有计划地把在重庆的一批党内外干部分别送到延安、苏北以及香港、南洋一带，或转入西南内地。另一方面，从斗争需要出发，周恩来同志提出在重庆要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与党配合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党亟需有些党外人士对各方面进行联系，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还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洞察国民党内部的动向。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上层人士中，有些人早在抗战初期即与周恩来同志在南京、武汉有过接触；到重庆后，又参加着党领导下的一些政治活动。他们拥护党的政策，并团结在党的周围。由这些同志联络其他一些同志，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的条件是成熟的。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就是适应当时这种形势和革命工作需要，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的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在重庆组成的。

(二)

一九四一年夏，在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和王若飞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和王炳南等同志的酝酿，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发起人会，亦即成立会，是在重庆领事巷十号康心之公馆（即屈武同志住所）召开的，参加的共有十八人，他们是：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昆仑 王炳南 邓初民 刘仲容 许宝驹
许宝騤 阳翰笙 闵刚侯 吴茂荪 侯外庐
屈 武 阎宝航 高崇民 郭春涛 梁蔼然
赖亚力 曹孟君 谭惕吾

(邓初民、郭春涛后来退出)

在这次会上，王昆仑、许宝驹同志被推为主要负责人。王炳南同志代表中共参加，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关于组织名称，成立时起名为“中国民族大众同盟”，经过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为“民革”。嗣后，为了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同志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简称“民革”）相区别，一九四九年六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般被通称为“小民革”。（参阅附件一、二、三，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两次谈话皆称该同盟为“民革”，六月的讲话中改称为“小民革”。实际上，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治组织，“小民革”成立在前，“民革”成立于六、七年之后，两者并无大小之分，也没有组织上的有机联系。有不少“小民革”成员参加了“民革”组织，那是因为一方面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是“小民革”的政治任务之一，另方面也是由于各个人政治历史条件所形成的。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惯地被简称为“小民革”已成为客观事实，自亦不必更改。特在此加以说明，以免引起人们的误解。）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有较严密的组织。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既有中共党员

参加又有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团体，它的成员也有参加其他人民团体的，因此它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活动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它积极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尽量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反对民主的情况下，它从国民党内部去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破坏旧政协协定，公开发动屠杀人民的内战，这时，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国民党内部进行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特别是利用它的成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置身敌人内部的有利条件，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国民党内政治倾向较好的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同时，它还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深入的了解，向党提供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情况。此外，它还努力协助国民党民主派的活动，配合中国共产党进行各方面的政治工作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等等。这些，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任务。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之后，成员逐步发展到近二百人。除了在重庆开展活动外，有的回到北平沦陷区（如许宝騄同志），有的前往外地（或杜斌丞、屈武同志去陕西），分别开展工作。

一九四五年春，在重庆举行了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有四十五人出席，会期两天。大会由王昆仑主持，汪季琦担任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王炳南作政治报告，许宝驹作组织报告，并选出中央委员二十一人，名单及代号如下：

（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振瀛（兴） 王昆仑（冈） 王炳南（彪）

刘仲容（量）	许宝驹（轩）	许宝骙（发）
阳翰笙（墨）	沈志远（近）	吴茂荪（盛）
杨明轩（朗）	闵刚侯（柔）	汪季琦（年）
杜斌丞（相）	屈 武（纬）	金仲华（贵）
侯外庐（内）	高崇民（敬）	徐淡庐（恬）
曹孟君（孔）	阎宝航（元）	
赖兴治（隆）	（即赖亚力）	

（三）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于国民党反动派大后方统治最严的时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各主要机构中进行秘密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战和民主的工作。有些成员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府内所担任的较高的幕僚职位，经常把了解到的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等情况，及时向党组织反映。如赖亚力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十多年，刘仲容、刘仲华也长期在桂系李、白身边工作，都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有的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会议场所，揭露蒋介石集团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如王昆仑在一九四五年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另外，在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中也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于八月二十八日亲临重庆，举行重庆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在重庆红岩村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负责人王昆仑、许宝驹和屈武，并招待晚餐，谈了一个通宵。会见时，周恩来同志和王炳

南也在座。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备战的真实情况，并提出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表示赞赏，他首先对“小民革”同志们经常提供的情况表示感谢，认为这些材料对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同时，他对争取国民党内部进步势力的问题十分关心，勉励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努力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工作。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曾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这个机构进行一些工作。王昆仑曾以常务理事名义主持会务，随后屈武、刘仲容先后以秘书长名义主持会务。侯外庐担任《中苏文化》杂志主编，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曾应邀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庆祝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大会，受到陪都文化界以及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邵力子等数百人出席了大会，盛况空前。

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经常往返延安、重庆之间，每次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总要邀集“小民革”少数同志座谈，传达党中央新的方针、政策和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可以说“小民革”的工作一直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曾谈到在重庆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会见的情况，提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这些朋友对党的政策了解得透，理解得深。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月于北平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同志两次谈话中，都提到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与“小民革”同志的那次会见，认为谈得最相得的是“小民革”的朋友。

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期间，中国民主革命同

盟的成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在此期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编辑出版了六期《人民观察家》。它是油印的内部刊物，由王昆仑主要负责，汪季琦等同志担任编辑。该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和主张，发给“小民革”成员阅读，以便统一思想认识。此外，还刊登了一些介绍和解释旧政协议案中有关争论原委的文章。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组织领导了一个革命青年组织——中国民主实践社（简称“民实”）。这是由一些革命青年参加的秘密组织，主要负责人有曹孟君、蒋燕等，在抗战期间及人民解放战争期间都开展了一些群众性的民主革命活动。

(四)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中央领导机构从重庆迁到上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活动。当时，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执行其内战政策，向人民解放区发动反革命战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把反内战、反独裁，从国民党内部瓦解其反动统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在南京，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中担任立法委员的同志，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提出和平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做了不少的工作。同时，还支持上海、南京等地的人民团体和学生所展开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还利用自己有利的工作条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的掩护了共产党员的电台，有的帮助党搜集所能得到的重要情况材料。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在一部分文化教育界、知识界人士中继续发展组织。梁希、许宝𫘧、涂长望、潘菽、薛愚、

郑伯奇、俞平伯、董每戡、叶丁易、费青等同志先后加入了“小民革”，他们在文化、教育、知识界人士中也都做了不少工作。

(五)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国内战争形势根本转变，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在这期间，蒋介石集团对爱国民主人士加紧进行迫害。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进行工作。在上海的有吴觉农、金仲华、闵刚侯、徐淡庐、孙晓村等；在南京的有于振瀛、谭惕吾、陈建晨等；许宝驹经常往返宁沪两地，负责组织推动工作；许宝驹等离沪赴港后，在上海设立国内工作委员会，由于振瀛、胡绣枫、秦柳方等负责；在北平的有余心清、许宝骙、袁翰青、孙承佩等；在东北的有高崇民、阎宝航以及苏从周等；在重庆的有彭友今、赵景生、王健行、甘祠森等；在成都的有田一平、胡春浦等；在西安的有杜斌丞、杨明轩以及马文彦等，在江西的有汤允夫等。其中北平是当时军调处执行部的驻地之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北平的工作在一段时间曾得到叶剑英同志的亲切指导。在上述这些人当中，杜斌丞同志被反动派逮捕，慷慨就义，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壮烈牺牲；余心清同志因密设电台与延安联系策动孙连仲起义并掩护一批共产党员，在北平被捕，同案被捕的有丁行同志和梁蔼然同志，丁行同志惨遭杀害；陶敬之同志在重庆解放前夕为革命而献身。

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部分负责人离开了国统区，从事反蒋斗争。许宝驹、曹孟君、金仲华，侯外庐等前往香港；王昆仑、赖亚力、吴茂荪等先后去美国，

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美国积极开展民主活动。一九四八年六月，吴茂荪从美国到香港，这年冬，他同许宝驹、曹孟君、侯外庐等先后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王昆仑、赖亚力等也从美国取道苏联到达东北解放区。

一九四八年，全国战局急转直下。这年冬天，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京津战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留在北平的成员，和中共地下党以及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在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中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在此期间，刘仲容奔走于南京、武汉、北平之间，为配合和谈进行秘密活动。在此期间毛主席曾接见刘仲容，了解白崇禧的动向。四月一日，南京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屈武、刘仲华担任了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和谈达成协议，并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屈武同黄绍竑一起被派飞往南京，由于李宗仁、何应钦南京政府拒绝签字，和谈终告破裂。屈武经上海前往新疆，策动起义，在新疆和平解放中起了积极作用。

（六）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陆续来到北平。周恩来同志曾先后三次同“小民革”的同志们作了亲切的谈话，给大家很大鼓舞。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六国饭店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少数同志的谈话中，充分肯定“小民革”在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起的政治配合作用。他开头说了这样几句话，